

反右派鬥爭的歷史定位

• 李 尋

1957年6月，中共發起的反右派鬥爭，將55萬多知識分子、民主黨派人士和黨政幹部劃為右派，對現代中國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當時代的波瀾遠去，人們有可能以歷史的眼光進行反思的時候，數十萬人的悲慘遭遇所激起的同情淚水形成一股道德譴責的漩渦。根據1978年以後複查平反的數字，有54萬多右派予以改正（其中有些是從寬處理的），維持原案的只有5,000人^①。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所謂右派根本就不存在，反右派鬥爭是純粹的冤假錯案。中國共產黨在總結經驗教訓時仍堅持反右派鬥爭是有必要的，但又拿不出有力的證據，只歸結為當時黨的領導人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犯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

然而，當我們以冷靜的理性把握歷史時，便會發現，中共堅持反右派鬥爭的必要性蘊含着多麼尖銳而執着的政治原則，善良的道德情感又導致了對歷史多麼嚴重的誤解。

1957年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儘管千差萬別，但從事情的性質上看無非兩種人。一種是真正的右派，數量並非很多，但也不像後來平反時再次確定的那麼少。另一種儘管他們人數眾多，但只是這場政治運動的殉葬者，不能決定事件的根本性質。

右派的政治主張與歷史淵源

1957年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儘管千差萬別，但從事情的性質上看無非兩種人。一種是提出了與中共政治原則不同的政治主張的人，這些主張的價值取向

和具體構想都與中共的思想對立，這種人是真正的右派，本文所使用的右派概念就是指這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的數量並非很多，但也不像後來平反時再次確定的那麼少。當時22名有影響的民主黨派上層人士右派中，只有羅隆基、章伯鈞、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5人維持原案，其他如費孝通、曾昭掄、黃藥眠等均被平反。事實上，這些被平反者的思想與言論在本質上與章伯鈞等人並無差異。由此可以推測出，在後來被中共認為是錯劃的右派中也有一部分是我們所說的真正的右派。另一種並非由於自己的政治見解，而是由於其他的原因（如僅給本單位具體領導提過意見等）被劃為右派的人，其實是被冤枉的無辜者，儘管他們人數眾多，但只是這場政治運動的殉葬者，不能決定事件的根本性質。

右派的政治主張大致包括下述內容：

(1)否定馬列主義的神聖地位。他們反對將馬列主義教條化、神聖化。章伯鈞諷說：「馬列主義只有那麼幾條，我就沒興趣，不值一學。」^②南開大學教授雷海宗直接了當地說馬克思主義在1895年以後就停止了發展^③。還有更多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從另一個角度提出馬克思主義存在着某些空白，要以現代西方社會學和經濟學加以填補。這些言論雖然不是對馬列主義的直接挑戰，但無疑是對馬列主義絕對地位的挑戰。

(2)要求保持民主黨派的獨立性。民主黨派人士從各個角度對中共的批評，圍繞的核心就是抵制中共不斷削弱民主黨派政治地位的趨勢。儲安平點名要向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請教^④：

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1949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的6個副主席中有3個黨外人士，4個副總理中有2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人可以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際上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為了擴大民主黨派的勢力，民主黨派的某些負責人對1949年初中共限定的發展範圍提出異議，當時中共只允許他們在原國民黨員、資本家及知識分子上層發展成員。中國民盟副主席章伯鈞說這是「防區制」和「包幹制」，應加以打破。民盟的另一位副主席羅隆基也說：「共產黨在工農群眾中發展，而民主黨派不能在工農群眾中發展，主要在舊知識分子中發展，而他們多是三、四十歲以上的人，這個矛盾應盡快解決。」^⑤他們準備趁中共的政策是「放」的時候大力發展民主黨派的組織，「發展一兩百萬人不算多」^⑥。針對建國以後中共統戰部門常干涉民主黨派內部事務的情況，民主黨派人士提出抗議，強調民主黨派在法律地位上與中共是平等的，反對中共凌駕於其他黨派之上的作法，民主黨派機關報《光明日報》主編儲安平稱之為「黨天下」，認為這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根源^⑦。

針對建國以後中共統戰部門常干涉民主黨派內部事務的情況，民主黨派人士提出抗議，強調民主黨派在法律地位上與中共是平等的，反對中共凌駕於其他黨派之上的作法。



1957年5月25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時發表講話，號召青年們「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並強調指出：「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是完全錯誤的。」

(3)對國家體制和國務管理原則提出自己的主張。右派提出了與中共權力架構和運行方式不同的政治體制設想和國務管理原則，他們主張加強政協和人大的政治地位，使這些機構切實發揮作用。章伯鈞提出將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當作政治上的設計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⑧民革中央常委譚惕吾建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機構要充實，要發揮它的作用。共產黨員到這個權力機關來監督政府，掌握政策，把共產黨內各部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裏的各種委員會。在人大常委會內可以設黨組，吸取非黨人士參加工作」，「司法、律師、檢查對執行國家制度起槓杆作用」，不宜統一在一個黨委的領導之下。這位著名的律師還指出，必須根據法律來治理國家，「黨制定政策，應在憲法之內」。中共應該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會制成法律，再由國家管理機關根據法律制成各種法令，通過法律、法令的實施體現黨的政策，不應在法律、法令之外，再發內部指示」^⑨。在政治體制和國家管理原則上，右派並不反對195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只是反對中共凌駕於國家政權之上，使憲法規定的政治體制不能依法運轉。

(4)對個人權利提出的要求。和中共倡導的集體主義原則不同，新聞界和文化藝術界的知識分子發出了對個體權利的呼喚。他們不滿黨組織對「新聞自

由」、「創作自由」的干涉，反對新聞的黨性原則，提出新聞的客觀、公正和藝術至上的原則，反對中共思想政治工作對個人生活領域的控制。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描述了黨控制群眾的情況：「通過積極分子，隨時隨地記下別人『不正確』的言行，向上級匯報，由支部集中到總支，大的問題又集中到黨委，層層佈置，批判這個，批判那個。」^⑩人民大學講師葛佩琦揭露出一種極端的現象：「有些黨員六親不認，連兒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兒子入黨給媽媽來信稱同志。」他指責部分「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⑪。

(5)對中共具體工作的批評。幾乎每位右派的意見都是從對中共具體工作方法和政策提出批評開始的，問題涉及到各方面，如特權現象，好大喜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等等。

將上述內容視為右派的政治主張，一方面是由於它們與中共所堅持的馬列主義神聖化和中共的超法律的領導地位等觀念截然不同，另一方面，也由於右派的這些見解並不只是出於對當時政治現實的不滿，它們還具有自己的價值基礎和歷史淵源。它們來自清末民初就一直存在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群體中的自由民主精神，這一精神在與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做鬥爭的過程中形成了他們獨特的政治綱領——第三條道路，既反對國民黨的獨裁，也不滿意共產黨的政治活動方式。他們主張以蘇聯的經濟民主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造成中國的民主，這個國家的主權是屬於人民的，實行憲政，實行法制，任何個人和黨派都不能超出法律規定的地位。經濟政策方面主張國家在確定人民的私有財產的同時，確定公有財產，實行計劃經濟。然而國民黨不斷強化的專制與共產黨力量的不斷壯大，使這批中間勢力的政治空間逐漸縮小到無法生存的程度，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麼屈從國民黨的專制，要麼追隨共產黨的革命。他們對國民黨已經失望，對共產黨的未來還抱有希望，所以最後選擇了接受共產黨領導的道路，放棄了第三條道路。但這道路的精神始終沒有泯滅。

著名的大右派當年幾乎都是第三條道路的倡導者。羅隆基這位英國費邊社領袖拉提斯的弟子深受乃師「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在20年代末就寫下了《論人權》等重要的人權論著。儲安平在解放戰爭中以主編客觀、獨立的《觀察》雜誌知名於天下，他不僅對國民黨的專制作出了堅定的反抗，還對中國共產黨做了犀利的剖析，「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⑫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道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政治精神來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中國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是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而言，共產黨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⑬這些人當初對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就持懷疑態度。1949年以後，他們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信念，只要一有時機，就以各種方式加以鼓吹。章伯鈞多次提過，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還能存在，就在於他們有民主制度。在他被迫做的檢查中，他承認自己特別看重資本主義國家的有兩點，「一是它的科學技術，一是它的民主自由。」^⑭

1957年右派的政治主義，無非是「第三條道路」在中國共產黨取得統治地位

國民黨不斷強化的專制與共產黨力量的不斷壯大，使中間勢力的政治空間逐漸縮小到無法生存的程度，最後選擇了接受共產黨領導的道路，放棄了第三條道路。但這道路的精神始終沒有泯滅。

後的另一種表述，基本屬於英美民主主義範疇。但很難說這些主張具有階級色彩，他們並沒有試圖扭轉當時國家對資產階級進行改造的政策，只是要求資產階級的資產被贖買之後，給予他們政治上平等的公民地位。與國民黨時期的「第三條道路」不同，他們希望在消滅了資產階級的前提下，在中國建立起民主政治。

反右派鬥爭的理論基礎和具體決策

中共自從誕生起，就不是一個很注重實用主義的政治團體。它的創始者們都是充滿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所以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理論原則對其政治行為所起的作用遠遠超過現實政治關係。反右派鬥爭與其說是右派對中共進攻引起的刺激，不如說是中共政治理論合乎邏輯的現實展開。反右派鬥爭的理論基礎是毛澤東所概括的在政治思想戰線上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這一理論是中共革命理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的革命理論在1939年就已成形，1940年初，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精煉地加以表述，「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⑭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前者是後者的必要準備，後者是前者的必然趨勢。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起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它既不同於歐美資產階級共和國，也不同於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所採取的過渡的國家形式」^⑮，「國體——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⑯。1949年的勝利在中共看來，僅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的是無產階級與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的人民民主專政，所以可以容納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民主黨派和社會賢達，在政府中給了他們一部分職位。1956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其實是中共革命的第二步——社會主義革命。這場改造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在當年就完成了。毛澤東就此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我們已經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勝利。但是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方面我們還沒有取得完全的勝利。」^⑰「還必須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⑱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在中共高級領導人看來，就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⑲。這一革命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結合在一起，才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全部任務。

政治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是資產階級政治代表人物右派，他們的社會基礎是已經被剝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的70萬民族資產階級和500萬知識分子。因為這些知識分子大多數「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⑳革

政治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是資產階級政治代表人物右派，他們的社會基礎是已經被剝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的70萬民族資產階級和500萬知識分子。

命的目的是通過政治手段，將右派從國家政權中驅逐出去，並從思想上加以批判，使人民民主專政，變成無產階級專政。反右派鬥爭的實際作法是這一理論最好的注腳。1958年1月31日，毛澤東發佈命令，撤銷了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的政府部長職務，2月1日，撤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龍雲、委員黃琪翔的職務。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中的右派委員也悉被罷免。到1959年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後，國務院38位部長、主任中非共產黨員只有9人（而且都是中共認為思想進步的「左派」），比例由原來的37%下降到23.6%^②。反右派鬥爭的範圍「主要是在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進行」，在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中一概不提反右派鬥爭的口號，也不劃右派^③。

上述清晰明確、邏輯嚴謹的理論，說明反右派鬥爭絕不只是一個突發的偶然事件，而是中共革命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階段，它或遲或早都要發生，1957年只不過提供了發生的具體契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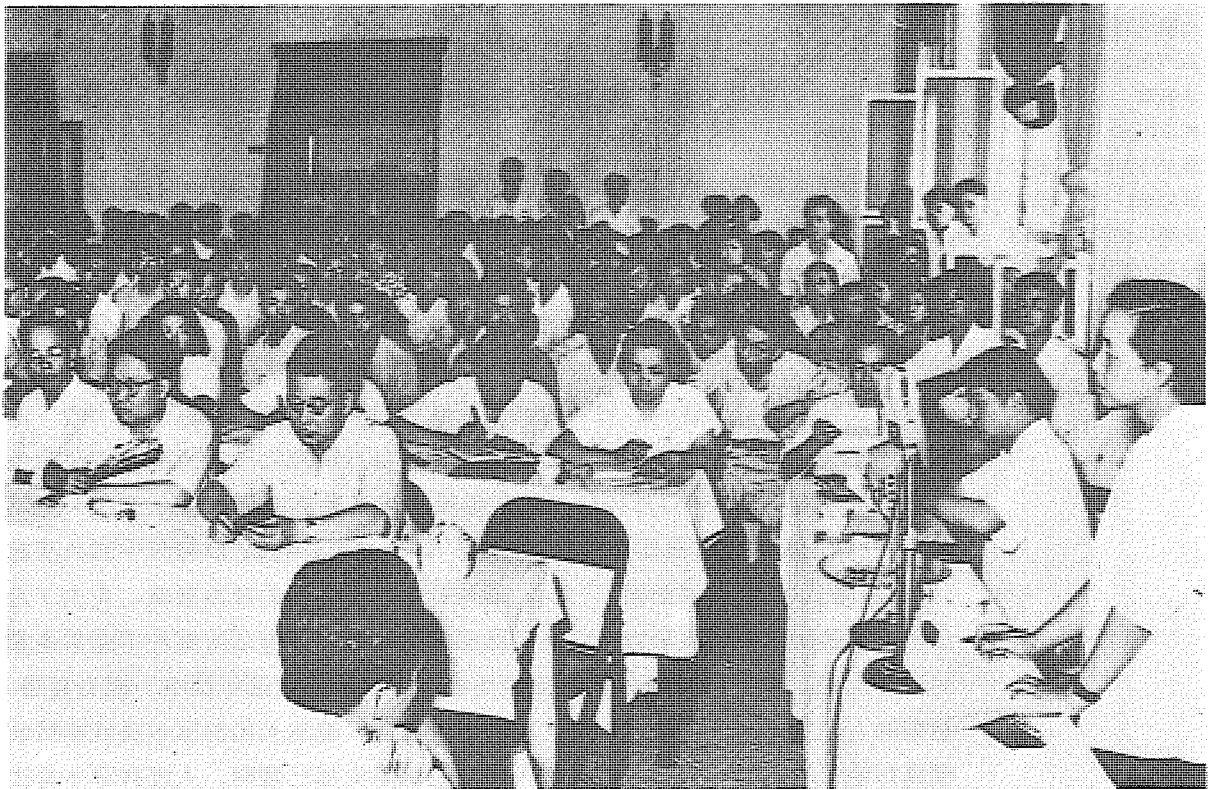
反右派鬥爭絕不只是一個突發的偶然事件，而是中共革命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階段，它或遲或早都要發生，1957年只不過提供了發生的具體契機。

理論原則是通過具體政策體現出來的。在考察中共具體決策過程時，某些研究者將當時的政策差別給予過多的重視，認為1956年初以後，中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政策，1957年4月決定整風，毛澤東親自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幫助中共整風等，這是「放」的政策，因為這時中共還沒有「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意圖。而在1957年5月中旬之後，大鳴大放中湧現出對共產黨的激烈批評，超出了中共的預想，導致中共決定反右，並採取引蛇出洞，繼續鼓勵鳴放的戰術，使更多的右派暴露出來。到6月8日正式開始反右派鬥爭，採取了「收」的政策。上述事實確實存在，中共在總結經驗教訓時，也就是以「放」與「收」的政策差別與轉換為基點，指出由於右派鬥爭的進攻，使黨的領導人對階級鬥爭做了過於嚴重的估計，犯了左的錯誤，導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然而，這種差別不是絕對的。在本質上，「放」與「收」始終是統一的，「放」的目的就是為了「收」。在1957年3月的第八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中共統戰幹部在討論「放」與「收」的時候，總的基調是認為「有放就有收」，「放」的目的就是使資產階級分子進一步暴露，好加以改正。在「收」的方法上，還打算採取秋後算帳式的政治鬥爭，而只是準備用思想教育手段解決「放」的過程中暴露出來的錯誤思想^④。也就是說，「收」是一貫的政策，所謂差別與轉換只是發生在「收」的具體方法是用思想教育方法還是政治鬥爭方法之間，而不是「放」與「收」兩種根本政策之間。事實上，中共的思想教育方法與政治鬥爭方法的區別也不是很大，所以說，基本上不存在中共犯左傾錯誤的問題。

對右派分子的劃分是早在1957年4月之前就完成的。1956年7月到10月，中共統戰部召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在會上，右派分子的一些基本觀點已經表達出來。統戰部長李維漢針對這些觀點，1957年4月4日在第八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1956年下半年「一股反社會主義制度的風，又一股反思想改造的風，逐漸刮起來了。這兩股風都是反社會主義的風」、「這股風主要是從右派那裏吹出來的，右派是這股風的主帥、軍師」。對哪一個人是右派中共早就有固定的看法，李維漢部長在他的回憶錄裏談到每次考慮進入政府的民主黨派人士時，都要使左、中、右都有名額。既然反右派鬥爭的理論基礎已經具備，右派也暴露了他們的觀點，為甚麼中共沒在1957年4月做出反右派鬥爭的具體

決策呢？也許這是一個黨的最高領袖個性的問題。毛澤東的自信和詩性思維方式曾使他在確定自己對形勢的控制力量的同時，過於高估了自己的胸襟，認為自己能容忍右派的存在。所以他能在已經知道了右派的基本立場和意識到應該進行一場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還誠心誠意地邀請民主黨派的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對反右派鬥爭做出具體決策的直接契機不是右派加重了對中共的攻擊，而是右派中的某些言論觸及了毛澤東本人的心理禁區。據李維漢回憶，毛澤東是在1957年5月14日左右聽到匯報，知道羅隆基在座談會上說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之後，下定反右派的決心的^②。羅隆基這番話在性質上對共產黨的威脅並不大，但深深地刺激了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情結。眾所周知，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毛澤東始終有一種蔑視的傾向。這與他個人的歷史有關，儘管他知識豐富、學問淵博，但沒有受到過正規的高等教育和留學教育，曾被黨內受到過較高層次教育的領導人歧視和打擊，加之長期在農村從事游擊鬥爭的生活，使知識分子成為他心理上的一種壓抑力量，心內不免有自卑的陰影。一旦受到這方面的刺激，馬上就激起自尊心的強烈反彈，對知識分子進行加倍的蔑視和打擊。延安整風運動、對梁漱溟的批判等等，都是這一情結的具體表徵。所以羅隆基這句無關共產黨政治統治痛癢的話，使毛澤東推翻了1956年1月周恩來代表中央宣佈的知識分子已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結論，再次將知識分子定為資產階級，並做出反右派鬥爭的決策。毛澤東決定反右派時，不存在對階級鬥爭估計過於嚴重的問題，他很清楚「現在國內形勢很好，我們能夠鞏固地掌握工農黨政軍及大多數學生。國際形勢很好，美國處在困難地位。」^③造成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原因，是黨的高級領導人估計在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中有10%左右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的指示」，對反右派鬥爭作了部署，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反右派的鬥爭。圖為北京新聞界舉行批判右派言論的會議。



的右派^②，各級幹部當作任務指標來完成，沒有右派也要造出些右派來。

從時間上看，中共做出反右派鬥爭的決策時，也不是發生在中共後來所指控的右派的「猖狂進攻」之後。5月15日毛澤東決定反右派時，右派還沒有採取任何主動的「進攻」動作，他們繼續在中共的動員下表達自己的看法，絕大多數激烈言辭是在此以後「放」出來的。5月中旬以後，高等學校的鳴放達到高潮，6月6日，章伯鈞召集民盟一些成員在政協俱樂部開會討論形勢時，認為高校的學生可能上街，他們想利用學生的力量作為壓力，自己以中間調停人的身分出現，從中共處獲得更大的讓步，顯示民主黨派的政治地位。6月7日，章伯鈞將這一層意思反映給了周恩來總理，但周未置可否。6月8日，毛澤東向黨內發出了反右派鬥爭的指示，《人民日報》也發表了社論〈這是為甚麼〉，反右派鬥爭正式開始。右派對中共的所謂進攻，其實不過是按照中共設計好的程序做出的符合中共需要的表演，就像天真幼稚的孩子與機智深沉的權術大師玩的一場不平等的遊戲一樣充滿黑色幽默般的滑稽。而所謂中共在右派的「猖狂進攻」下對階級鬥爭形勢做了過於嚴重的判斷，也不過是事後安慰受難者心靈的精美童話。

冗長的歷史回響

反右派鬥爭不同於中共歷史上任何冤假錯案之處，就在於它的確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力量和觀念的衝突。如果說1947年10月國民黨政權取締民盟標誌着「第三條道路」在國民黨專制統治下的破產的話，那麼，反右派鬥爭就是「第三條道路」在中共掌握了政權之後的破產，而且是徹底的破產，因為它再沒有機會被重新提起了。這一事件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標誌着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它所造成的巨大回響飄盪在此後整個中國歷史的長廊，久久不散。即便是走向世紀末的我們，也只能在可能視及的範圍內，做出有待進一步深化的總結。

它的直接後果是改變了中國政治力量的結構，1957年以前的中國政治舞台上，民主黨派作為一種異質的政治力量與中國共產黨同時存在，儘管勢力微弱，但畢竟是種存在，能發出不同的聲音，對中共起了一定的制衡和監督作用。反右派鬥爭之後，民主黨派的名稱與組織形式雖然還得以保留，但能堅持民主黨派作為獨立的政治實體存在的右派領導人都被撤職，餘下的領導人一方面一貫就是中共的附從者，另一方面懾於階級鬥爭的恐怖，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爭先恐後地向中共表達忠心，甚至提出自行解散的建議來換取中共對他們忠誠的承認。1958年3月16日，北京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天安門舉行「社會主義自我改造促進大會」，通過「自我改造公約」，發起向中國共產黨「交心運動」，並推廣到全國。「交心」就等於交出去自己的政治靈魂。失去了自己政治主張的民主黨派事實上已經不能成其為政黨，僅僅是附屬於中國共產黨的群眾組織。民主黨派的非黨化使中共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唯一權力實體。抽象的人民主權論者總是帶有對人民群眾的偏愛，認為人民群眾本身就能對政權進行監督和制約，其實，所有的人類政治活動史都已證明，人民群眾本身從

反右直接後果是改變了中國政治力量的結構，1957年以前的中國政治舞台上，民主黨派作為一種異質的政治力量與中國共產黨同時存在。反右派鬥爭之後，民主黨派事實上已經不能成其為政黨，僅僅是附屬於中國共產黨的群眾組織。民主黨派的非黨化使中共成為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唯一權力實體。

來就不具備在實際政治運作中制衡監督的功能。沒有自己政治組織的任何一個階級或階層的群眾，在政治運作中都是毫無意義的空洞符號。所以當民主黨派非黨化以後，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實際監督共產黨，中共在空前淨化的政治環境中實現了絕對的領導，蔑視法制的慣性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獨一無二的地位。然而，當外在的制約力量消失，它本身的矛盾就可能激化，因為外在力量的存在能夠使它的成員在一致對外的利益要求下團結一致，即使搞一定程度的清洗也是為了保證這種團結，而且為了與外在的政治力量抗衡總得將國家利益當作實際的內容加以充分考慮，充分尊重國家利益才是與其他政治力量抗衡的最好武器。如今沒有了外在的政治力量，它本身的團結需要便讓位於內部的政策分歧與權力鬥爭，最後導致了絲毫不存在半點階級鬥爭意義的黨內階級鬥爭，黨的最高領袖為了打倒另一位黨的領袖不惜發動一場全民的「內戰」，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分裂帶來整個國家的動盪。人民號稱是國家的主人，卻只能在唯一的權力實體領導下進行無休止的「革命」和鬥爭。

反右派鬥爭也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1957年前的中國社會是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大的階級構成的分層結構，但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剝奪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反右派鬥爭又將知識分子打入底層。1957年以後，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下降的同時，經濟收入也不斷下降。有材料表明，1957年到1978年21年間，知識分子的工資不斷下降，1978年以腦力勞動為主的行業每月平均工資為49.1元，比1957年下降了0.8%，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平均實際工資下降了13.3%^②。此後的中國社會逐漸成為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構成的沒有差別的平面結構。政治管理體制的級別差異在黨的統一領導下成為普通人無法問津的特殊領域。在廣闊的社會中，唯一能帶來利益差別的是工業化所造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以城市為目的的人口水平流動成為社會流動的主要形式，社會結構的平面化使人口的垂直接流動無法發生。沒有垂直接流動的社會是最沒有發展活力的社會。人們追求的只是一勞永逸的城市戶口和鐵飯碗，而得到這些並不須要給社會創造更多的知識和財富。合理的分層結構是保證社會正常發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每個社會的成員都處於沒有激情，沒有追求的狀態，整個社會也只能處於死氣沉沉的停滯狀態。合理的原則是知識量和財富量應成為分層的標準，知識分子理所當然地應處於社會結構的上層，這樣，位於社會低層次的人才會有向上奮鬥的壓力和動力，而且，要想步入社會上層就要掌握更多的知識或者創造更多的財富，社會總體便獲得了發展的活力和最大的效益。水平型的社會結構也許滿足了平均主義者的價值需求，但扼殺了社會發展的基本活力。1957年留下的歷史重負絕不只是知識分子待遇偏低的經濟問題，而是整個社會停滯不前的巨大靜勢。從這一角度看，中國今天的改革無非是要打破水平型的社會結構，創造合理的分層型結構。但壓下來容易提上去難，水平結構本身的堅固性，與維持這一結構的源遠流長碩大無比的平民意識，還有權力實體超政治的向社會的衍射，可謂錯綜複雜。各階層都想改革，又都想居於上層，但卻沒有超然於社會結構之外的力量來進行粉碎和重整。所以，改革沉重蹣跚，走一步又退一步，很難有所突破。令今天改革派領導人煩惱的正是30多年前令他們興奮的，在這看似對偉大人物的意志極

反右派鬥爭也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1957年前的中國社會是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大的階級構成的分層結構，但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剝奪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反右派鬥爭又將知識分子打入底層。此後的中國社會逐漸成為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構成的沒有差別的平面結構。

其馴服但又根本無法搖撼的歷史面前，永遠沒有不折腰的英雄。

隨着右派分子的流放，反右派鬥爭也滅絕了他們所代表的精神價值。從清末民初以後存在的民主自由傳統自此斷裂，這一裂口是如此乾脆利索，以致於沒有一絲延續。

從此以後，官方意識形態成為全民族獨一無二的精神生活，這種意識形態以充滿農業文明色彩的平民意識為底色，以壓抑個性的集體主義為形式，以不斷的鬥爭和革命為手段，以人人平等、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為終極指向。人類的心理天性被迫適應它的結構形式，以畸形的方式表現出來：對利益的追求只能以政治野心的方式加以表現，而對道德價值的皈依只能以愚昧的方式表現。按這種意識形態塑造出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對社會進步的理解就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對個人價值的理解就是對黨的事業的獻身，對民主自由的理解就是巴黎公社及十月革命式的革命獨裁。他們將勞動人民尊崇為創造歷史的唯一力量，這種平民意識極度張揚的另一面就是對過去一切社會上等階層及他們的價值的極度貶抑，對以往一切知識和文化全面摧毀，形成對知識的全面反動，不僅導致了民族人文精神的崩潰，也導致了自然科學的停滯和落後。歷史再也沒有提供那被割斷了的價值傳統得以復修的機會。因為任何文化重建所面臨的直接前提都是現存的意識形態，且不說政治結構的因素，單論這一意識形態本身，也不能不承認它具有狂熱而美的奪人魅力。所以，此後一切新思想的產生，幾乎都是這一意識形態分裂的結果，如果欲走向普遍，則更須要借助它已成的語匯乃至思維模式。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都再不會有地道的英美民主自由精神出現。任何迥異於現存意識形態的其他價值都必須或者經過它的過濾，或者過濾它，總之要具有某些它的原素。至於其禍福利弊，恐怕只有請後來者評說了。

隨着右派分子的流放，反右派鬥爭也滅絕了他們所代表的精神價值。從清末民初以後存在的民主自由傳統自此斷裂，這一裂口是如此乾脆利索，以致於沒有一絲延續。

註釋

- ①②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840；頁634。
 ②⑩⑫⑬⑮ 《新華半月刊》14期(1957)，頁148；頁86；頁92；頁83；頁84。
 ③ 《新華半月刊》21期(1957)，頁58。
 ④⑦⑧ 《新華半月刊》12期(1957)，頁24；頁24；頁5。
 ⑤⑥⑨⑪ 《新華半月刊》13期(1957)，頁114；頁116；頁119。
 ⑭⑮⑯ 《毛澤東選集》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頁665；676；677。
 ⑰⑱⑲⑳㉑ 《毛澤東選集》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頁417；頁404；頁461；頁409；頁433。
 ㉒ 蕭超然主編：《中國政治發展與多黨合作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頁194。
 ㉓ 鄧小平：〈整風運動報告〉，《新華半月刊》22期(1957)。
 ㉔㉕ 《歷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檔案出版社，1988)，頁314；頁339。
 ㉖ 周方良主編：《知識分子經濟政策研究：困境和出路》(春秋出版社，1989)，頁89。

李 尋 青年學者，自由撰稿人。